

伊斯兰文明在美国的体验

——从爱德华·W·萨义德及其《掩盖伊斯兰》谈起

毛小林

内容提要 爱德华·W·萨义德的《掩盖伊斯兰》阐释了伊斯兰文明被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媒体“妖魔化”的内在过程及其原因,进一步揭示了经济政治权力与话语权的内在合谋。在话语权被垄断的情境下,美国等西方媒体制造了一个被扭曲的、刻意掩盖的、偏见化的伊斯兰世界的图景。这是萨义德在美国所体验到的失真的伊斯兰文明。

关键词 《掩盖伊斯兰》; 伊斯兰文明; 爱德华·W·萨义德
作者简介 毛小林, 硕士,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教学院讲师(上海 200083)。

Abstract Based upon Professor Edward W. Said's prominent work: *Covering Islam*, this article aspires to elucidate how Islam has been demonized by the western media, especially America's. By employing Foucauldian theory of power and knowledge, this essay further explores the innate complicity betwee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and discourse. Owing to the monopoly of the power of interpretation, Islam in American media is a distorted, deliberately covered and prejudiced reflection of the reality. That is the distorted Islamic civilization experienced by Said in the US.

Key words *Covering Islam*; Islamic Civilization; Edward W. Said

一、萨义德及其著述

2003年9月25日,爱德华·W·萨义德在美国纽约去世,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与哀悼。英国广播公司、美国国家公众电台、《纽约时报》、美国《国家》杂志、英国《卫报》、埃及《金字塔报》、《巴勒斯坦编年报》等都辟专栏发布讣闻,褒贬兼评。当代伟大的哲学家乔姆斯基曾褒奖他说:“假如我们不想成为权力的仆人,而是道德的行动者,萨义德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到底是谁,以及我们必须做些什么。”^①

萨义德出生于耶路撒冷的一个阿拉伯家庭,但由于父亲的影响,他信仰了基督教。在埃及开罗,他受到了英式的高中前教育。1951年夏,他离开埃及,取道黎巴嫩、巴黎、伦敦,到达纽约。在美国念完高中后,他于1953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就读。1957年获学士学位后又回到埃及;一年后回到哈佛大学读书,1963年获博士学位,在美求学时间共11年。^②在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时,他完成了备受世人瞩目的《东方学》一书,获得美国国家图书批评家奖,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

但是,萨义德的影响并不限于学术圈。正如《华盛顿邮报》书评所指出的那样,萨义德是一个杰出的、独特的结合体,他既是学者、审美家,又是政治活动家,几乎在每一个领域都挑战并激发了人们的思维。《纽约时报》书评则称,欲研究西方宗主国与殖民国间关系的学者,都无法绕过萨义德。

作为一个活跃的政治活动家,萨义德曾长期担任巴勒斯坦流亡国会的独立议员,和巴解领导人阿拉法特关系甚密,但后因不满1993年签署的《奥斯陆协议》里一些涉及土地方面的妥协,遂转而批评阿拉法特,此后两人关系渐远。

萨义德是巴勒斯坦民族建国理想在美国最忠诚的代表。可以说,如果没有萨义德的努力,巴勒斯坦人在美国人眼里仅为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劫持人质的“恐怖分子”形象。正由于他多年在美国媒体上对伊斯兰文明的学理诠释,美国社会才对伊斯兰社会有了一个更为客观的了解,也直接促成了美国和巴解组织的接触与谈判,为马德里和会铺平了道路。

但是,萨义德并不是一个狭隘的反犹主义者,虽然他被无数次地贴上这样的标签。作为一个非穆斯林,他始终坚持巴勒斯坦建国,期望最终实现与以色列的和平共处。他同情受到德国纳粹迫害的犹太人,认为犹太人应在中东获得一块生存栖息地。

①【美】爱德华·W·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的批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封底评论。

②【美】爱德华·W·萨义德:《格格不入》(彭淮栋译),三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页。

但谴责以色列依仗“受难者”的角色，变成了“施难者”，错误地、过度地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压迫和排挤。

萨义德是一个非常多产的学者，他的 20 多部著作都值得一读。但在大陆学界，对萨义德著作的翻译与研究相对滞后。《东方学》出版 20 多年后，三联书店才于 1999 年翻译出版了这部经典之作，随后又陆续出版了他的《知识分子论》与《文化帝国主义》及《格格不入》等。由于翻译滞后等原因，萨义德的其他重要著作如《巴勒斯坦问题》、《掩盖伊斯兰》、《世界、文本与批评家》、《笔与剑》、《流离失所的政治》、《流亡沉思录》以及《权力、政治与文化》等尚无简体中文译本。此外，萨义德散见于各处的大量论文、演讲以及评论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这些缺失与不足，对我们研究或理解萨义德其人其作，都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萨义德的重要著作《掩盖伊斯兰》^①早在 20 多年前就已在美国出版，但迄今在中国大陆却还没有译本，我国大陆学界便很少提及此作，知晓此书并对其英文原著进行通读的学者更是寥寥。笔者认为，欲更全面理解萨义德，就不该忽略与遗漏《掩盖伊斯兰》。其实，萨义德已经告诉我们，《掩盖伊斯兰》与《东方学》、《巴勒斯坦问题》有着有机的联系，三者组成一部完整的“三部曲”。《东方学》是第一部，主要探讨伊斯兰文明、阿拉伯人、东方三者与西方的关系；《巴勒斯坦问题》是第二部，主要探讨犹太复国主义与巴勒斯坦穆斯林间的斗争历史；《掩盖伊斯兰》则是最后一部。^②《掩盖伊斯兰》不仅对我们了解真实的伊斯兰文明有巨大裨益，而且对理解美国媒体的特性与运作，以及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也至关重要。可以说，这是萨义德用来破解西方对非西方世界（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经常被错误地等同为伊斯兰世界）的假设密码的一本精彩之作。

二、《掩盖伊斯兰》

①本书的全名为：《掩盖伊斯兰：媒体和专家是如何决定我们看待非西方世界的》。以下为叙述方便，书名从略。有学者将此书误译为“报道伊斯兰”，其实只要仔细研读本书导言部分及正文第 170 页，我们就不难发现：明确无误的翻译应该是“掩盖伊斯兰”。

②【美】爱德华·W·萨义德：《掩盖伊斯兰》，纽约 Vintage 图书公司 1997 年版，导言第 49~50 页。

《掩盖伊斯兰》出版于 1981 年，1997 年再版时添加了新的导言。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旨在研究美国新闻报道中的伊斯兰文明；第二部分则是通过伊朗革命的个案分析来展现西方媒体语境中的伊斯兰世界；第三部分着重谈论权力和知识的关系。

在《掩盖伊斯兰》里，萨义德运用了大量确凿的实例，如伊朗革命，海湾战争，一直到世贸中心爆炸事件，揭示了西方学者及其“以自由、开放、客观为导向”的媒体如何通过所掌握的话语权，利用狭隘和反面的伊斯兰文明图像，妖魔化地描写报道伊斯兰文明，不遗余力地制造出针对伊斯兰文明的偏见，塑造了美国主流社会对其他少数群体（尤其是伊斯兰文明）的刻板印象与偏见，为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假想敌，从而实现了权力与话语的内在合谋。

萨义德通过仔细考察美国媒体对伊朗革命的报道，尤其是伊朗人质危机的报道，为我们形象地描述了这个“妖魔化”的过程是如何成形的，展示了那些被学者扭曲的图像和语汇如何被媒体用来纠集美国“爱国主义”，显示“残忍的”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的病态式的仇恨。“伊朗继续在美国民众中间引起了歇斯底里般的关切，不仅是因为在 1979 年 11 月 4 日，伊朗学生对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极端非法和污辱性的侵占，也因为美国媒体对此事件，及随后几年对伊朗的妖魔化式的、极端细节性的、高度聚焦的关注”^③。

萨义德在《掩盖伊斯兰》中反复阐明的观点是：西方媒体中的“伊斯兰”这个概念，部分是虚构，部分是意识形态标签，部分是对作为宗教的伊斯兰最小的指称。西方所指称的“伊斯兰”在现实中无法找到它真正的对应物，因为伊斯兰世界是一个极端多样化的世界——它拥有八亿多人口，横跨亚非两大洲，幅员广大，拥有许多不同质的社会、国家、历史、地理状况以及文化。^④萨义德指出，正因为西方不能完全理解伊斯兰文明，美国的媒体将伊斯兰文明描绘成了一个片面的、单调的、简约化的图像，一个与恐怖主义、极端组织等同的词语。这些扭曲和故意误导所导致的结果是：西方新闻媒体掩

③同 ，第 81 页。

④同 ，第 1 页。

盖了关于伊斯兰世界的真实图像,并将一个片面、神秘的伊斯兰世界“喂”给了西方民众。

由此,萨义德揭示了西方以恶意语汇、虚假报道和对冲突进行宗教性与种族性重新定义等方式,影响普通民众认识伊斯兰世界的实质。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于是在西方传媒的殖民主义语境中成了反美宣传和非理性的基本符号,伊朗革命基本上定下了西方民众对伊斯兰世界的印象基调,伊斯兰几乎成了“心灵创伤”的代名词。^①拥有大量石油的阿拉伯酋长、戴着蒙面头巾的妇女及挎枪的年轻人在街上焚烧美国国旗便成了美国主流社会对伊斯兰世界的一种单调和刻板的认识。

萨义德认为,少数几个所谓的“东方学家”一直影响着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认知,“至少是从18世纪末开始,现代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反应却是被一种极为简约化的思维所垄断,这种东方学家式的思维基础是一种想象的但又是两极化的思维立场:它将世界剖为两个不平等的部分:一个大的,但却是‘他者’的,叫做东方;一个是‘我们自己的’世界,叫做西方”。只要伊斯兰文明被视为是东方的一部分,那么西方就倾向于怀着敌意和恐惧的心理,视其为一块内部没有差别整体。^②如重量级人物刘易斯以及像《大西洋月刊》这样的刊物,就将伊斯兰世界描绘为“无理性”和“反西方”的刻板图像并使之凝固化,且制造了数量惊人的、基于扭曲的假设之上的大量著作和知识。由于这些文章在政策制定和媒体之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导致政府和新闻媒体对伊斯兰世界产生了偏见。萨义德在《掩盖伊斯兰》中的观点和《东方学》的观点遥相呼应。

萨义德指出,西方从很早开始就一直将伊斯兰世界当作一个挑战和可怕的竞争对手。从中世纪开始,伊斯兰就被描绘成是一个“背叛的(Apostasy),不敬的(Blasphemy),混沌的(Obscurity)魔教”。穆罕默德也被描绘成“伪先知,冲突的播种者,纵欲主义者,伪善者,魔鬼的代理人”^③。

直至今日,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理解还像以前那样,完全依赖于一个有限的和含有恶意的意识形

态框架,其中“充满了热切,防御性的偏见,有时甚至是憎恶”^④。所有的罪恶事件因此都和伊斯兰发生紧密的关联。一些不幸事件的发生,像俄克拉荷马联邦大楼的爆炸、越战中灭绝人性的屠杀,事后均被证明与伊斯兰教无关。^⑤“细节,人性,阿拉伯穆斯林的生活情感,这些都没有引起甚至那些是专门向西方介绍伊斯兰世界的专家的注意。”^⑥

通过过滤,媒体制造了共识^⑦,取代了民众的思考并最终蚕食了他们的理性世界。由于置疑、异议、反对的缺席,美国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偏见得到了民众的“默认”,它逐渐控制并吞噬了原本属于正反两方观点论辩的阵地。这种知识垄断性的精神奴役,使民众失去了对灌输性信息进行质询和辨析的能力。长期在这种定势思维下,众多美国主流民众便逐渐变得懒于独立思考,失去了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蜕变为充满偏见的顽固分子。至此,这些狭隘、偏执、有政治企图美国媒体就通过创造一个假想的“伊斯兰敌人”,制造了庞大的东西文化对立的壁垒,强化彼此间存在的藩篱和隔阂,从而阻碍了文明之间的真正理解与沟通。

三、权力与知识

在《掩盖伊斯兰》中,萨义德向我们解释了伊斯兰文明在西方被妖魔化的不幸遭遇。伊斯兰文明在西方尤其在美国被臆设化为高度政治化的、充满敌意的负面图像。在萨义德看来,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关系高度政治化的因素有三:第一,西方流行的反阿拉伯—伊斯兰的偏见;第二,阿拉伯和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及其对美国犹太人与西方人文主义文化和公众的影响;第三,中东的大国政治、石油经济以及民主自由的以色列与邪恶专制的阿拉伯世界的简单二元对立。^⑧

④同,第8页。

⑤同①,第9页。

⑥同,第28页。

⑦关于美国媒体是如何实施新闻检查制度,以及美国公众舆论是如何被利益集团所利用并成为宣传工具的问题,赫曼和乔姆斯基(Herman and Chomsky)的《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是对萨义德此观点有力支持。参阅【美】赫曼、乔姆斯基:《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纽约Vintage图书公司1995年版。

⑧【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5页。

①【美】萨义德:《掩盖伊斯兰》,第50~51页。

②同,第4页。

③同,第5页。

萨义德指出，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关系高度政治化是由权力与话语的共谋而造成的。其实，他在1978年的《东方学》里就指出，知识和权力的联系就是《东方学》潜在的主题。萨义德的《东方学》深刻揭示了启蒙运动和殖民主义的卑鄙合谋，以大师般的手法解密了受西方列强和利益集团资助的西方学术界是如何在暗地里“刻板化，妖魔化，神秘化”伊斯兰和其他非西方世界的。他认为，东方学不是西方纯粹的虚构或奇想，而是一个被人为创造出来的体系，其中蕴含着几百年积淀下来的物质层面内核。这一物质层面的积淀使作为与东方有关的知识体系的东方学成为一种得到普遍接受的过滤框架，东方就是通过此框架进入西方的意识之中。^①东方学通过学术发现、语言重构、心理分析、自然描述或社会描述将这些利益体系创造出来，并且使其得以维持下去，其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权。^②

作为《东方学》的姊妹篇，《掩盖伊斯兰》的主要目的就是权力与知识、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赤裸”的分析，从而彰显话语背后所隐藏的权力与潜在的阴谋：西方纯粹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通过媒体与所谓的学者，创造并规定了关于非西方世界“他者”的低等陪衬角色。这种不平等的结构关系，阻止东方站起来为自己说话。^③

在权力与知识关系的话语分析方面，萨义德无疑深受其前人福柯(Foucault)的影响。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柯揭示了权力和话语的内在合谋。在他看来，从来不存在客观性的话语，权力和知识在话语中发生关系，权力就存在于知识之中，成为知识的根本特征或本质。权力利用知识来扩张社会控制，因而知识也不是客观中立的，它虽以真理为外表，但实际包裹的却是权力阶层的意识形态。控制权决定了一个社会的话语内容和方式，而话语则描述、创造和定义了一个政治现实。权力与话语有着不可分离性：“无论关注什么问题，福柯最终发现的都是话语，而话语又与权力密切相关。在他看来，话语构成了一般的文化实践的基础，权力的运作方式体现得最彻底也最复杂的地方就

是话语。”^④亦即，在话语中起作用的总是权力，叙事本身就是权力关系之下的言说形式。话语实践体现了特定时期的社会群体的一种无意识结构，而这种无意识结构是隐藏在话语实践背后的一个更为宏阔的整体，它决定了话语的实践可能性方式和现实性构造。这就是福柯所强调的“权力”^⑤。

在福柯看来，权力具有连续性、重复性和自我再生性，它构成了历史运转的机制，并成为整合社会的决定因素。因为，权力必须进入话语并接受话语的控制，而话语的力量又正是来自权力，特定话语实践方式正是特定权力的实践方式。规范的形成与真理的产生都是因为权力话语的作用。^⑥他指出：“我们应该承认，权力产生知识（而且，权力鼓励知识并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使用知识也并不只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与知识是直接相互指涉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也不会有任何知识。”^⑦

萨义德继承了福柯的话语理论，在《掩盖伊斯兰》中指出，“所有的知识都是在于诠释”。对特定文本的诠释是获得对特定文化了解的基础；这些特定的诠释具有特定的企图和目的。“每个诠释者都是一个读者，但不存在一个价值中立(Value-Free)的读者。”他还揭示了权力、话语和诠释相互缠绕、交错并为彼此服务的内在关系。即，“不存在不以利益为指向的诠释，理解和知识”^⑧。诠释方式影响了知识和权力在学术圈、政府、尤其是美国媒体中的作用。为此，他举例说，1982年以色列放纵对贝鲁特难民营里的巴勒斯坦人进行大屠杀不但没有改变美国对以色列的正面看法，反而强化了美先前对巴勒斯坦人的“恐怖主义”的印象。原因在于巴勒斯坦人缺乏政治权与话语权。叙事是话语的基本单位，没有话语权，事实是沉默的，巴勒斯坦人悲惨的叙事也就无人倾听。“事实根本就

①【美】萨义德：《东方学》，第9页。

②同，第16页。

③【美】爱德华·W·萨义德：《萨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页。

④董学文主编：《西方文学理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1页。

⑤同，第452页。

⑥同，第453页。

⑦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

⑧【美】萨义德：《掩盖伊斯兰》，第165页。

不为自己辩护,事实需要一个被社会接受的叙事来吸收它,维护它,传播它。”^①

媒体对伊斯兰和其他非西方世界的神秘化和妖魔化的扭曲,势必会创造出一副天生的、关于“异类”的有害图像,从而会在这个世界上制造并传播永久的仇恨和敌意。权力和媒体的合谋,以及存在于整个美国学术界和思想机构中的结构性歧视(Structural Biases),无疑会延续西方对伊斯兰和其他非西方世界的憎恨和歇斯底里式的仇恨。“每一个欧洲人,不管他会向东方发表什么看法,最终都几乎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中心主义者……东方学归根结底是一种强加于东方之上的政治学说。”^②他因此呼吁,为了达到对某种不熟悉事物(例如伊斯兰世界)的公正理解,民众必须拥有以下两点品质:常识和批判性的思考。这两者“不应只是某一特殊阶级的特权,或是几个所谓的‘专家们’的私有财产,而应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的、和智识上的品质,所有可欲者都能获得”^③。

然而,伊斯兰世界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被妖魔化的个案。假如我们对殖民文学有足够的了解,就应该知道所有非西方、被殖民化的世界其实都是这个妖魔化模式中的受害者。种族化的西方,尤其是今日极端敏感的美国,最擅长通过所控制的媒体将异己的世界负面地刻板化,从而达到政治目的。其他的批判思想家如乔姆斯基等已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乔姆斯基认为,美国媒体已不再是监督政府的公器,已堕落为美国国内经济、政治统治阶层的“宣传工具”,为这些特权阶层的社会、政治、经济利益而服务,它们不再反映公众的诉求。^④在此情况下,美国的媒体变成了一个高度过滤的系统,异见常被排斥和边缘化,许多批判者也于这个排他性的系统内“在自由的假象下被洗脑”(Brainwashing Under Freedom)。^⑤萨义德敏锐地觉

察到了西方媒体对粗暴、野蛮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即非西方)所显示的非理性、狭隘及恶意的本质。

在“9·11”事件后,萨义德痛苦地发现,通过政府—媒体—学者三者的内在纠结,伊斯兰竟沦为恐怖主义与宗教狂热的同义词。利用“自卫和反恐”的名义,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施行了可怕的报复,更多的巴人被屠杀,无需证据和理性的争论;而美国却向以色列提供部队、武器、甚至核武器。更没有人质疑这些随意被屠杀的嫌疑者到底是真正的恐怖主义者,还是“被证明为”恐怖主义者,抑或是“将来的”恐怖主义者。只需几个无知与语无伦次的弗莱舍式的白宫发言人就可以制造“共识”。没有怀疑与疑问,没有异议与己见,更无需证据等繁琐细节,“恐怖主义”以及对恐怖主义的追击完全变成了对那些没有话语权敌人的谋杀。^⑥结果在美国,巴勒斯坦人的痛苦生活被媒体掩盖了,没有多少人关注他们的命运,他们注定是不幸的。非西方的“他者”在美国的媒体那里得到的只是冷漠、忽略与掩盖。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里,只有借助历史和现实的文本分析,才能真正洞察到戈必诺(Gobineau)^⑦式的白人优越的种族主义理论与情结,在美国精英与权力阶层眼里还是一个不会褪色的、意义丰富的、能激发歇斯底里情感的关键符号。权力的本质在于它企图永久地延续其影响。尽管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显性制度已慢慢失去了光泽,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直到今天还以非制度的“潜流”形式继续发挥淫威,危害极广。

哲学家德里达(Derrida)的睿智不在于他充分关注了事物两方面的互相依存性,而在于他深刻地揭开了其依存性后面的控制和被控制,定义和被定义,决定和被决定等不平等的依附关系。^⑧德里达所批评的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不仅设置了种种二元

①参见萨义德在1984年为《伦敦书评》所写的 *Permission to Narrate* 一文。

②【美】萨义德:《东方学》,第260页。

③【美】萨义德:《掩盖伊斯兰》,第5页。

④Peter Mitchell and John Schoeffel, eds., *Understanding Power: the Indispensable Chomsky*, the New Press, 2002, 15.

⑤同, p.13.

⑥Edward Said, "Slow Death: Punishment by Detail," *Al-Ahram Weekly*, August 8~14, 2002.

⑦法国人 Comte Joseph-Arthurde Gobineau 在1853年开始陆续发表系统的种族主义理论著作《人种不平等论》。他将人类分为三等,认为白人具有最高的智力与最强的体力;黄种人位居中间,但太懒散、虚弱、被动;黑人为最下等之种族,智力低下,简直就是机器人。参阅 David Spur, *the Rhetoric of Empire*,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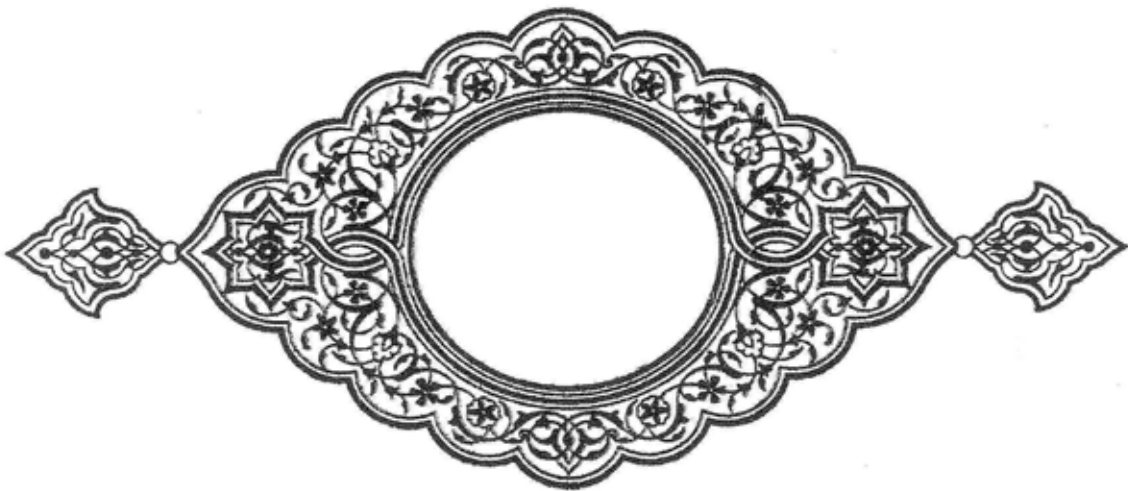
⑧【美】布莱斯勒:《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简介》,新泽西州 Prentice Hall 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126页。

对立，如主体/客体、本质/现象、能指/所指、真理/谬误等等，而且还为这些二元对立设置了等级，二者并非是在同一层面的平衡关系，而是一种从属关系，第一项处在绝对的优势地位。^①萨义德则透过美国社会政治纷繁芜杂的表面，揭示了其背后“制造共识”的权力黑手。

运用福柯权力话语理论去透视后殖民语境中“东方”地位的还有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等学者；斯皮瓦克的下属缄默理论（Theory of Subaltern Silence）通过印度殉夫女子的不幸命运指出，被父权与殖民主权利所压迫的阶层根本没有获得话语权的可能，她们根本代表不了自己。而代表这些“边缘化”的人的任务自然落在独立知识分子的肩上。^②福柯曾强调，知识分子的天职在于改塑他人和自己的思想与意识，知识分子不是声称掌握真理的人，而是努力靠近真理的人；知识分子在权力话语前面，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与对峙，通过冷静的权力话语进行分析而揭露事实的真相。^③

萨义德就是这么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一直都“以流亡来隐喻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不故步自封，对现实不满，采取批判立场，注定了必须在权力核心之外，成为边缘人，‘抗拒，不被纳入，不被收编’，‘对权势说真话’。他善用这种实质与隐喻的双重流亡情境，积极介入学术与政治，成为在英美世界拥有发言权的第三世界的少数精英。在他看来，批评不是毁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是为了改善个体乃至群体的不幸命运。“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提升生命，它在本质上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支配、虐待；批评的社会目标是产生出有利于人类自由的非强制性的知识。”^④

（责任编辑：杨 阳 责任校对：李 意）



* 本期所用阿拉伯文书法作品均选自《陈进惠阿拉伯文书法选》。

①董学文主编：《西方文学理论史》，第443页。

②Ania Loomba, *Colonialism/Postcolonialism*, Routledge, 1998, pp. 231~237.

③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④Edward W. Said,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Harvard UP, 1983, p. 29.